



第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已走过了96年的历程。96年，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却是一段较为漫长的岁月。在这96年中，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风雨雨，面对内忧外患，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审时度势，成功地实现了三次历史性的大转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并继续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



一、救亡图存——艰难曲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曾经引领过人类文明的发展，创造过令人称羨的辉煌。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就鼓励其信徒“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①。而为人们所熟知的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则被马克思誉为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即将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但从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却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在西方列强军事进攻、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外交讹诈以及文化渗透等方式的入侵下，最终使清王朝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也沦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近代中国的沦落和社会性质的变化，使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反帝反封建也就成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先进分子，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相继登上政治舞台，探索近代中国的富强之路，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历史得出结论：他们由于阶级局限的因素，都不能成为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历史也在呼唤一个新的政党登上历史舞台，承担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

1.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两次历史性大转折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十二人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大会完成了三大任务：其一，建党定名。大会决定建立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并根据《共产党宣言》而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其二，确定纲领。大会制订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

^① 王永平：《一位中国皇帝与阿拉伯商人的对话》，《光明日报》2011年12月22日。

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家所有制”^①；其三，组建机构。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并非偶然，而是应社会历史的召唤，在诸多因素俱已具备的情况下水到渠成的结果。

其一，具备了社会基础。自1840年西方列强入侵以来，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反抗侵略、救亡图存的斗争。然而，无论是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之梦，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还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其最终的结果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但传播了民主思想、启迪了民智、奠定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继续深入开展的群众基础，也为一个新的政党诞生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其二，具备了思想基础。1915—1919年相继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通道。特别是十月革命，使一大批中国先进分子抛弃了对西方的迷信，从向西方学习转变成以俄为师，如毛泽东后来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 这一结论的一个重大结果就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为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三，具备了阶级基础。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国由于忙于战争而无暇东顾，给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趁机得到了发展。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前，中国产业工人已达到200多万人。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五四运动取得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阶段的标志，中国工人阶级在运动中所展示的阶级优点和巨大力量，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工人阶级，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意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其四，具备了组织基础。还在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前，中国各地已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如1920年8月陈独秀等建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月李大钊等建立了北京共产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7页。



主义小组。同年秋，毛泽东等在长沙、董必武等在武汉、王尽美等在济南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此外，周恩来等在法国巴黎、施存统等在日本东京也建立了早期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些组织的建立，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党——中国共产党奠定了组织基础。

其五，具备了干部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造就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形成。五四运动后，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一批知识分子都相继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在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骨干，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干部基础。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和最高纲领，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革命的主要敌人和任务的洞察。从此，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预示着中国的民主革命将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中国革命就出现崭新面貌，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领导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在残酷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要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由此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的标志是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同，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也成为中国革命高涨的新起点。

1926年7月，以推翻北洋政府为目标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在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叶挺率领的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主的北伐先遣独立团，更是所向披靡，被誉为“铁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北伐军基本摧毁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领域，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与此同时，两湖、两广的工农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开展。特别是由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成立了上海市政府，为北伐军进入上海打开了大门。

人民力量的大发展不仅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惊恐万分，也让一些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右派和新的野心家们坐立不安，在共同阶级利益的驱使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决定联手反共。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

变”，打响了破裂国共合作、背叛新三民主义的反革命枪声。之后，汪精卫也在武汉举行“七一五分共”行动，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成为由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国民党南京政府也是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国民党政权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并采用一切手段加大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镇压。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仅在1927年后的一年里，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就达到2.6万人，群众近30万人，全国各地的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近6万人减少到1万余人，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建立以来的第一次严重挫折和关乎生死存亡的历史考验。党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问题。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在之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已经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斗争的失败说明在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下，首先夺取与坚守中心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残酷的现实状况，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这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最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理论，并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革命新道路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从大革命失败到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成功地实现了一次生死攸关的大转折。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遍布湘、赣、闽、浙、粤、桂、豫、皖、陕、甘等十几个省的300多个县，并建立了拥有近10万人的红军队伍，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聚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工农红军的创建，被国民党暨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心腹大患，在连续四次对革命根据地大规模军事“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于1933年9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



的第五次“围剿”。在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中国革命再次遭受严重的挫折，也再次面临严峻的形势和生死存亡的考验。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从8万多锐减到3万多人、长征途中处处被动挨打的残酷事实，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左”倾错误领导的危害而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现状。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攻克贵州遵义后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2. 全民族抗战和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1931年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三省，1932年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1935年又策动了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即“华北事变”），实现了对华北的实际占领。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在东北、华北等地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局部抗战。在东北，原部分东北军和地方抗日义勇军、农民暴动武装于1933年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合各路抗日武装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14年的抗日斗争。在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面对日军挑起的“一二八事变”奋起抵抗。在华北，东北军、西北军等进行了“长城抗战”，在喜峰口、古北口等地英勇抗击日军的侵略。面对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号召。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内战、抗日救国。这一宣言顺应了全国民众的愿望，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护。

面对强敌入侵和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并亲赴西安“督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多次苦谏蒋介石停止“剿共”积极抗日遭到拒绝后，于1936年12月12日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引起了国内政治局势的大震荡，面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

共产党审时度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亲赴西安，经过多方工作和谈判，最终与蒋介石达成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从内战走向全国性的全民族抗战的起点，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至此，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国性的全民族抗战序幕正式拉开。

在整个抗战期间，尽管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国共两党之间却始终存在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抗日战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局。

国民党：

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抗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这一阶段日军以国民党为主要作战对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是对日作战的战场，承担了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任务。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相继进行了淞沪、徐州、太原、武汉等大的战役，并取得了正面战场自开战以来的首次大胜——台儿庄大捷。但在总体上却出现了正面战场的大溃退，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中，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大片国土相继沦陷。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主观原因则是战略路线和方针的失误。在抗战路线上“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即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民众，将希望单纯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在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而是采取单纯的阵地防御战”^①。在这种错误路线和方针指导下，尽管广大国民党官兵英勇奋战，但仍然免不了大溃退的结局。

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侵华日军对华政策的调整，即在政治上对国民党实施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军事上则将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变化。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则由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政治上于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在军事上则实行保守的收缩战略，并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最为典型的的就是1941年1月制造的“皖南事变”。正是由于国民党路线方针的再次错误，在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进攻中（即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正面战场又出现了第二次大溃退，损失兵力50多万，丢失城市146座，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陷。

^① 教育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共产党：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与国民党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依据敌强我弱的客观态势，始终坚持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宏观的战争指导思想和中观、微观的战略战术上提出了正确的策略方针，并始终保持坚定的抗日立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态度和对日作战的高昂斗志，坚定了友党友军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念，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①。1938年5、6月间毛泽东又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根据中日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②这一时代背景，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和双方力量的变化趋势，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结论。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作战，开辟抗日敌后根据地，迫使侵华日军不得不放弃在中国战场的战略进攻态势，转而将主要兵力用于对付敌后战场，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进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改变了侵华策略，把主要的军事力量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武装，敌后战场取代正面战场成为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承担了对日作战的主要任务，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华北、华东、华南三大区抗击日伪军数为例：

华北、华东、华南三大区抗击日伪简表

	时间	在华总兵力	抗击数	百分比
抗击日军数	1940年	80万	47万	58%
	1941年	61万	46万	75%
	1942年	55万	33.2万	60%
抗击伪军数	1940年	22.5万	22.5万	100%
	1941年	34.8万	34.8万	100%
	1942年	55.5万	55.5万	100%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页。

②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采取内线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办法，创造了许多新的战略战术，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从1944年起，敌后战场人民军队开始向日军发起局部进攻。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中国人民军队随之展开战略反攻，并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承担对日作战主要任务的同时，还要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和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通过制定正确的策略方针来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确保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确定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规定了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这些策略方针的制定妥善地处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各种关系，最大限度地发展了进步势力，团结了中间势力，并使顽固势力继续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策略和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浴血奋战，才维护和巩固了全民族抗战的大好局面，并成功地打击和消耗了侵华日军，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实现了敌我双方力量强弱对比的转换，实现了军事局面的逆转。在世界反法西斯进步力量的支持下，经过十四年艰苦奋战，终于赢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也在这场民族战争的考验中，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3. 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就广大民众而言，历经八年艰苦抗战、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强烈要求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但现实的情况却并不如人民所愿，如毛泽东所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



杂的斗争。”^①事实正是如此，关于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国共两党早在抗战胜利前就已表明了各自的看法和态度。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不仅一切要求民主的主张遭到压制，还通过了两个反共的文件：《对中共问题之决议》和《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蒋介石在会上也一再表示对中共“必消灭之”，“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②。而中共中央也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要求全党做好两手准备，要警惕内战。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更是明确地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③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又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希望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建立一个包括各党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为了争取和平、避免内战，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还亲率中共代表团飞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和军队两个焦点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最终使国民党政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在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协定》中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④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和平建国的方案。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6年1月10日，包括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实质上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内战政策加以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与和平民主方针得到了各方的认同。

国民党蒋介石和谈是假、内战是真，中国共产党对此也从思想、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做好了应对举措，即在思想上提高警惕、政治上加以揭露的同时，在军事上做好了自卫战争的充分准备。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自认为在美国的支持下完成了发动内战的准备，

①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7—608页。

②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③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方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3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84页。

便背信弃义，违背国共双方协定，调动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也自此拉开了序幕。

1947年2月，国民党当局限令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中共代表于3月5日前撤出，并封闭了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此举宣告了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人民解放战争历时三年，共分为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三个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国民党具有占领地区和人口、军队数量以及装备上的绝对优势，拥有军队430万人，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和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仅为国民党军队人数的三分之一，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和缺乏。内战一开，蒋介石原想凭借军事优势速战速决，但战争的结果却与其预期大相径庭。在战略防御阶段，人民解放军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而且还累计歼敌112万人，使战争出现了有利于人民力量的转化。

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自此，人民解放军开始实现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入国民党统治中心区的战略性转折。“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①

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战略进攻，共歼敌152万人，收复和解放土地15.5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700万，解放军兵力增加到280万人，而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兵力则减至365万人。

战略决战阶段（1948年8月至1949年10月）。1948年9月16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济南之战，开始了对敌战略决战的最后一击。之后，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73个师，154万余人，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基本被消灭殆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

1949年4月21日，在国民党蒋介石拒绝了国共双方和谈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后，毛泽东和朱德正式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开始了渡江战役。4月23日，人民解放军突破了蒋介石精心构筑的长江防线，占领南京，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5页。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的艰苦奋斗，经历了两次生死攸关的历史性转折，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28年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二、奋发图强——艰辛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新篇章，中国人民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面对百废待兴的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惊世举措，有成功实现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实践创新，有轰轰烈烈的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也有前进道路上的严重的挫折甚至是全局性的失误。在这些理论的思考和实践的探索中，成功的喜悦和挫折的反思相随，而这一切，都为后来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1. 为巩固新政权而斗争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新中国，对我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政策；国内国民党留给中国共产党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解放战争仍在继续，上百万国民党军队还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地区负隅顽抗，一些在战争中被击垮的残余部队和潜伏特务、土匪相勾结，破坏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扰乱新社会的安定。由于战争和拥有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尚未进行，使工农商业和交通运输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致使生产萎缩、物质匮乏、市场凋敝、物价飞涨，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民生困苦、矛盾凸显。这些严峻的情况和众多的矛盾，考验着新生的红色政权，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在对外政策上，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根据各国对待新中国的态度，明确宣布将联合苏联，

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与对新中国表示友好态度的苏联及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上，明确宣布废除旧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同时也明确宣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① “如果帝国主义各国采取承认中国的新政府的政策，那我们就要准备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② 尤其是对于美国，尽管美国政府长期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毛泽东仍然明确提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③ 并派人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多次接触，但终因美国政府坚持反共立场而未果。

中国共产党执行的外交方针和原则使得新中国在外交上掌握了主动权，在实际中取得了成效，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孤立、封锁，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建交高潮。到1951年5月，就有19个国家和新中国建交。其中不仅有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印度等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和瑞典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在对内建设上，为巩固新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针对现实存在的困难局面和纷乱繁杂的诸多矛盾，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抓住恢复国民经济这一破解困境的主要矛盾，确立了为争取国民经济基本好转的中心任务和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之后，便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巩固新生的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

新区土改。这是一场消灭封建制度的社会变革。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了对新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在土改中，遵循“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结合革命形势变化的实际，将解放战争时期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同时也将没收地主的一切财产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在农村多余的房屋，避免了土改中矛盾的激化。到1952年底，新解放区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沉重的地租负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建立国营经济体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完成民主革

^①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1页。

^②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③ 毛泽东：《关于稳住汤恩伯及外交对策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命遗留任务的重要内容，也是巩固新政权、建立新秩序的必然要求。这一任务是伴随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接受城市的进程，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体系完成的。到1952年底，国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全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已达240.6亿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为没收官僚资本企业的资产。

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稳定全国物价。巩固新政权、建立新秩序需要雄厚的资金，而百废待举却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为了从根本上控制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解决资金困难，1949年冬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财政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的方针。1950年2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3月3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规定全国军政机关的编制、统一全国财税收入、统一全国主要物质调配、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统一全国财政工作的举措使经济日趋走向正轨，国家的收支也日渐趋于平衡，从而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

“三反”“五反”。在推进军事和经济工作向前开展的同时，中共中央根据少数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蚀，堕落为腐化变质分子，以及一部分不法资本家腐蚀国家干部，并为之勾结侵占国家资产的现象，从1952年1月到10月，相继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是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廉、反对腐败的斗争，也是回击资产阶级反限制的斗争。斗争的胜利为巩固新政权、维护新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

镇压反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初，奉命潜伏于各地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反动党团骨干上百万，他们大搞破坏暗杀活动，制造紧张氛围。一些反动会道门如“一贯道”“九宫道”等也趁机编造谎言，诋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扰乱社会秩序，干扰各项工作的恢复进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反攻的时机已到，其破坏活动更为猖獗，妄图里应外合而一举颠覆人民政权。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民心，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为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量刑标准。这次运动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运动到1952年底基本结束，共破获600余起特务案件，清除了匪患，肃清200余万国民党残余武装，使国民党溃退后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基本上被肃清，为稳定人民政权和社会秩序，为支援抗美援朝和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创造了条件。

抗美援朝。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集结了16个国家的军队入朝参战，^①把战火燃烧到中朝边境，直接威胁我国安全。面对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在全面评估了国内外局势和充分考虑后，决定应朝鲜人民政府的请求和斯大林的建议，^②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连续进行了五大战役，歼敌23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扭转了战局，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在抗美援朝前线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国内也坚持边打、边稳、边建的“三边”方针，掀起了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开展了捐献飞机大炮、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爱国丰产等运动，既保证了对抗美援朝的支援，也确保了国内建设不受战争的影响。

1951年7月10日，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和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被迫接受苏联停战谈判的建议，开始停战谈判。历经两年的谈谈打打，双方最终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朝鲜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

除上述举措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党的建设、文教建设、政治思想等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由于对客观局势和问题把握准确，应对方针政策得当，采取措施坚决，因而仅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即实现了巩固新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工农业生产达到和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国民经济的恢复使得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物价得到有效控制，市场稳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社会秩序出现了安定团结向上的局面。

2.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虽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社会主义制度并未建立，中国的社会性质仍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同时，

^① 派兵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荷兰、泰国、希腊、土耳其、菲律宾、南非联邦、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此外还有瑞典、印度、丹麦、挪威、意大利为“联合国军”派出了医生和医疗船，日本也提供了后勤支持。

^② 1950年10月1日和3日，朝鲜人民政府和金日成首相曾写信和发电报两次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支援，斯大林也在10月1日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国政府派兵参战。



新中国虽然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从总体来看，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底下，难以满足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需要。而在土地改革取得全国性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历史任务，为实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规划的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两个转变”的根本任务，中共中央在1953年正式确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毛泽东一言以蔽之：“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①

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独立的必然要求和条件，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所言：“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② 依据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实现工业化不能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而应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发展生产力，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应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并行不悖。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通过巩固新政权的斗争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实现工业化的政治条件和经济基础，但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难以满足农业、轻工业、国防和其他行业发展的需求，其落后的状况如毛泽东所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③ 这种落后的情况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此，中共中央借鉴苏联发展经验，结合我国客观实际，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战略决策。这一战略思想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得到了体现。“一五”计划的制定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在实施中，以重工业为龙头带动其他，“重点建设，稳步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工业化的水平也有显著提高。

^① 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③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从1952年到1955年，现代工业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6.7%上升到33.6%，全国工业（包括手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所占比重由35.6%上升到42.5%。特别是机械制造业已初步形成了40个制造体系，能制造1900多种比较重要的产品，如火车机车、大型机床、电机、现代采煤机械、地质钻探机械等大型设备，在数量上已能满足国内需求的50%。^①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落后的农业牵制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改变旧有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通过农业合作化的方式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必需，也是新中国发展的现实要求，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通过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从互助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初级社（半社会主义性质）——高级社（社会主义性质）这样逐步过渡的方式来完成，前后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1951年9月—1953年12月）

农业生产互助组是一种个体经营、集体劳动的组织形式，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性质。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②毛泽东在同年10月和12月代中央起草的两份通知中明确要求“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③，并要求将此“当作一件大事去做”^④。在农村建立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就此开始，到1952年秋，全国已有约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

第二阶段：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12月—1955年12月）

这是一种农民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生产合作组织，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还在建立农业互助组阶段，中共中央就已经开始在各地农村试办了一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大规模建立初级社准备了条件。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在农村建立初级社就由试点转为大规模创建。在发展初级社的过程中，曾出现贪多求快的急躁冒进现象，毛泽东对此现象曾提出：“必须强调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合作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偏向。”^⑤

① 数据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

②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将这个决议草案作为正式决议公布。

③ 毛泽东：《逐步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④ 毛泽东：《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⑤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要求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实行停止发展、实行收缩、适当发展的“停、缩、发”三字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在1955年4月20日召开的汇报会上确定秋收前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之后，通过中央方针的贯彻和各地的整顿，使急躁冒进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建立和发展初级社的工作在总体上得以健康进行，所建立的初级社也产生了较好的成效。1955年夏收，全国65万个农业社中有80%以上的获得粮食增产。

第三阶段：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初—1956年12月）

这是一种以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个人实行按劳分配的合作形式，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从1956年春开始，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以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的阶段。按照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设想，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在1957年前后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然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再逐步转入高级合作化。但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由于把党内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加以批判，这就无形中助长了原本应加以克服的急躁冒进情绪。特别在1956年6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到1956年底，全国共建立合作社75.6万个，入社农户1.17亿多户，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87.8%的农户是加入的高级社。

随着高级社在全国大规模的建立和绝大多数农户加入高级社，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即宣布基本完成。

我国的手工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是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经济形式，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度，其重要性就更为突出。但分散的经营模式、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技术，已不适应新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让这一传统行业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青春，要逐步引导手工业者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其改造模式也基本一致：方针是积极引导，稳步前进；原则是自愿互利；方式是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半社会主义性质）——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性质）这样一种从供销环节到生产领域，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进行的步骤。到1956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发展到10.4万多个，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组）的从业人员达到603.9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总数的91.7%，合作化手

工业的产值 108.76 亿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 92.9%，标志着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用“赎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但马恩没有实践的条件。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首次将马恩的设想付诸实践，两次提出对资本家的财产实行赎买，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以发动内战来对抗苏维埃政权，列宁的愿望未能实现。三大改造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征，决定利用其积极性，改造其落后性，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利用、限制、改造；方式是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样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来完成“和平赎买”的。到 1956 年底，全国有 99% 的私营工业户和 82.2% 的私营商业户参加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标志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

三大改造中曾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造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和个别违反自愿原则等缺点和偏差，但在总体上是成功的。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和手工业者摆脱了长达几千年的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国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新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举，在改造中除了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改造外，还成功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人的改造，使他们从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实现了马恩和列宁对资本主义经济和平“赎买”的愿望。

三大改造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成功开辟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初步确立，这为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和对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成功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的建立，为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在有各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参



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妥善处理 and 协调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各种关系，基本方针和目的“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报告中，毛泽东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毛泽东也明确告诫全党：“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他充满信心的要求全党：“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和方针的理论基础。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党即将领导人民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这次大会主要有三大历史功绩：

其一，明确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大会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标志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我国已经得到解决，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据此，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求。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②

其二，确定了经济建设的方针。大会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规定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保证国民经济均衡地发展。为此，大会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其三，提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问题。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大会强调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要健全集体领导制度，防止个人崇拜。

除上述三方面外，八大还在经济管理、社会主义法制、思想文化、对外交往等方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74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面作出了明确的、富有新意和创造性的方针政策性规定。

中共八大的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八大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四化目标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清晰认识，至今仍有着指导意义。

在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中国共产党走了一条曲折前进的艰辛之路。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重申和发展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在报告中，毛泽东将我国存在的矛盾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即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指出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解决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式，但“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报告中，毛泽东再次重申了1942年延安整风时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①。报告对肃反、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文化艺术等十二个问题中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首次正式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

1957年4月27日，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有的批评虽然措辞尖锐，但用心良苦。其中也存在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乘机向党发动进攻，利用所谓的“大鸣大放”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全党供党内干部阅读，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和运动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夸大了形势的严峻性。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在斗争中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全国共划定55万多人为右派分子，其中绝大多数为错划。^②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不仅使许多党的优秀干部和党外知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763页。

^② 1978年中共中央对所划的右派分子进行全面复查，对错划者全部纠正平反。



识分子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长期压抑，而且导致在 1957 年 9 月 20 日—10 月 9 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背离了八大作出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作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的错误结论，为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泛滥埋下了隐患。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虽然提出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尽快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现状的急迫愿望，但从总体上看，这条总路线是在急躁冒进、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提出并通过的，是在成绩面前骄傲自满，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盲目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产物。这条总路线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在随之而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极度泛滥，使党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遭受严重挫折，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1958 年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错误开始有所觉察，并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开始纠正出现的“左”倾错误，一些思想和认识也开始回归理性和科学。1959 年 7 月至 8 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召开的本来目的是要在前一段纠“左”的基础上进一步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但遗憾的是，会上因彭德怀的一封信而错误地改变了会议原本的初衷，^② 错误地将彭德怀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并随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使纠“左”的进程被中断，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从理论到实践都得以泛滥和升级。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由于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反右倾”以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这种困难的严重程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③

1966 年 5 月，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并在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86 页。

^② 彭德怀的信约 3000 字，主要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一些“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要求“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60 页。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利用下使“左”倾思潮泛滥到了极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对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一种探索，其本意是要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在中国共产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其理论和实践依据就是在对中国政治形势错误估计基础上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违背了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也违背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正确理论方针，是完全错误的。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宣布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破产，同时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1976年10月，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争下，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曾经在政治和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指导思想和方针的失误，甚至出现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失误，使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遭受了严重挫折。但这些失误和挫折并未影响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信心，也并未中断探索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下，排除干扰，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突出成就：

其一，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尤其在航天、国防等一些高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后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其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科学技术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的专门人才。

其三，对外交往上取得重大突破，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成功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了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其四，为后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若干重要的正确认识与政策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不仅需要高度的政治热情，更需要尊重客观规律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仅需要学习和借鉴，更需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之路。



三、开拓进取——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的30多年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国际风云，也经历了第三次历史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国内考验。在国际风云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坚强堡垒和旗帜。在国内考验中，中国共产党扭转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并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向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 “左”的指导方针的终结和历史性转折的实现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和全国人民一方面强烈要求彻底清算和肃清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与流毒，在思想政治上回归正轨；另一方面也要求在思想和行动上彻底清算“文化大革命”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在对历史的反思和纠错中拨乱反正，重新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航道。但事与愿违，由于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①并在经济建设继续延续“左”倾错误，使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受到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

“两个凡是”方针引发的思考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即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检验真理。“两个凡是”一经提出就遭到党内多数人的反对，邓小平就不止一次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并一再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①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后被简称为“两个凡是”。

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①

鉴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阻挠了拨乱反正的正常进行，开展一场关于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指示，如何确定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势在必行。1978年5月，在邓小平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引导和支持下，^②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刊发。^③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性报纸和许多省级报纸都纷纷转载，一场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以燎原之势在全党、全国迅速展开。文章明确指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④文章的上述观点显然是针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也引起了党内的思想交锋，经过广泛的讨论，最终得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正确结论。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质上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争论，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束缚，是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实现历史性转折和拨乱反正作好了思想理论准备。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就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宣布将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方针和任务。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对于全国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明确指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很有必要。因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

①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②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定，邓小平重新回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③ 文章的原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福明老师，后经多人修改，由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定。

④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 这次会议打破了“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是一次为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奠定基础的会议。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一，会议坚决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之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确定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和指导方针：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左”的指导方针得以终结。

其二，会议坚决否定和果断停止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其三，会议审议了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作出了结论。会议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

其四，会议强调了社会政治安定和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要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首先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大会，大会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史经验的总结，为修正错误、全面拨乱反正，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历程。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在第二阶段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要求大家看到中国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强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② 这次会议把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路线的

^①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3页。

^②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4页。

顺利贯彻。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次会议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实施，是拨乱反正的具体体现。之后，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开展，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得以甄别和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冤假错案得以平反纠正，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决心、勇气和气魄，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基本的结论；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正确性；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里程碑作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2. 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

从理论到实践上的拨乱反正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即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并确立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共十二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最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十二大以后，中国即开始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全方位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改革开放在全国展开。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并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十三大正式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方针：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当时已基本完成；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邓小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马恩认为共产主义包括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属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曾明确把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中就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①他认为我国就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马恩和毛泽东在提出上面两个论断时，限于主客观因素，理性设想多于实践总结。邓小平发挥了两者皆备并有机结合的优势，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规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切方针政策制定的科学依据。

1989年6月，在经历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

1992年10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四大。大会最突出的功绩有二：一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进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

中共十四大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向深入发展，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承前启后，明确提出了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做好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②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这一理论在中共十六大上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①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② 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论一道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会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党在新世纪的三大历史性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十六大还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念。在随后召开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胡锦涛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集体。

在十六大的基础上，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又明确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党的目标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大任务之一，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迎来3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总结历史、开创未来重大意义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30年的历史经验，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归结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大会提出并详尽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大会立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一现实国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①在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外交往、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和举措，并继党的十六大后再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和过去相比，党的十七大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新的发展和创建：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9、10、11、14、15页。



其一，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概括和阐发。

其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

其三，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构成：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其四，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后，首次提出生态文明。

其五，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将反腐倡廉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形成了党的建设五大内容体系。

科学发展观和一系列新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的理解更加全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书写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新篇章。

2008年是严重考验与巨大收获交织的一年，中国经历了“5·12”汶川特大地震的严峻考验，同时也收获了成功举办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疾人奥运会、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航天任务顺利完成等喜悦。2008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国内出现多么大的困难，中国共产党都坚定不移地带领全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是曲折而艰辛的，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而令人鼓舞的。

首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①

其次，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页。

之路^①，是把中国引向繁荣富强的民族希望之路。

再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能力得到巩固和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文教、卫生、科学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得到增强，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祖国统一大业得到重大进展。1997 年和 1999 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海峡两岸的关系也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30 年来，中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从 1978 年到 2007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从 3645 亿元增长至 24.95 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 9.8%，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四位；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343 元增长到 13786 元，实际增长 6.5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34 元增长到 4140 元，实际增长 6.3 倍；农村贫困人口由 2.5 亿减少到 1400 多万；外汇储备由 1978 年的 1.67 亿、1989 年的 55.5 亿上升为 1.52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国防、外交、科技、教育、体育、文卫等其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 1979 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2003 年神舟五号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2005 年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顺利返回、2007 年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等，充分显示了中国的科技水平，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航天科技强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苏东剧变，1998 年南方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 年的非典疫情，2008 年的汶川特大地震和十几个省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考验，中国人民经受住了考验。历史再次作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人民的选择，是中国人民意志的体现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和中国梦的愿景规划

中共十七大后，我国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青海玉树大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等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取得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面对众多艰难险阻，中国共产党坚持深入推进各战线的改革开放和加强党的建设，在十七届二中全会上通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 页。



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五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决定对深化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201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90周年诞辰，胡锦涛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他在讲话中提出了在本世纪上半叶“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①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选举习近平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产生了第五代领导集体，成功地实现了领导班子的平稳交接。

中共十八大是在“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的国际背景下，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历程，“十二五”规划全面开始实施，“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

^①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5、30页。

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①的国内形势下召开的，是一次理论上承前启后、升格定位，实践中与时俱进、关注民生的大会。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大会的主题，明确回答了四个世人关注的基本问题：举什么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什么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怎么走——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达到什么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报告中最大的理论亮点有六个：

其一，重新定位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将其从战略思想上升到指导思想，并对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具体要求。

其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新阐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进行了理论概括，还从依靠力量、根本任务、必由之路、内在要求、根本原则、本质属性、必然选择、领导核心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

其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有了新提升。继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后，十八大将其提升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理论阐述，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建设节水型社会”等新的目标要求。

其四，对民生问题表示了强烈关注。报告中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将“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提出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这些都体现出了对民生的强烈关注和改善民生的强力举措，也体现出了国要强、民要富的新思维。

其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新概括。报告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并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1页。



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①

其六，对党的建设有了新的部署。报告要求全党“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并从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严明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等八个方面就“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作出了详细的阐述。

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复杂环境、严峻挑战、全新问题和历史使命有着明确而清醒的认识，也充满着对所做选择的坚定性和实现目标的自信心。报告对未来中国怎样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从指导思想到战略方针、具体举措的详细论述，这些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和具体方略的提出，不是靠凭空想象和一腔热情，而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因而实际、实在，合理、可行，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精神。

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愿景规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② 习近平和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则明确提出了“中国梦”，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9、40、37、34、36、31页。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50、16页。

目标奋勇前进。”^①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征程的开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执政理念的执政党，将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将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四、砥砺前行——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1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再次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习近平作的十九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承担什么历史使命、实现什么目标，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怎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等历史性重大问题。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②

中共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中明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① 《习近平论“中国梦”》，《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1月30日。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科学发展观一起确定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①是这次大会最大的理论亮点，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上取得了新的成果，揭开了新的篇章。

中共十九大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第一个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吹响决胜的冲锋号。同时为实现第二个目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凝聚共识、集聚力量。

1.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②

五年中，依据国内外出现的新形势、新变化和由此而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和新机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十二五”规划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顺利实施，取得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显著成效。

对于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从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民主法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人民生活、生态文明、强军兴军、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全面从严治党等十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

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2013年至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稳居世界第二。2013年至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短短五年中，共推出一千五百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2012年增加7311元，年均实际增长7.4%。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明显上升：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111元，比2012年增加4255元，年均名义增长7.4%。教育事业明显加强：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显著提高，2016年达到42.7%，比2012年提高12.7个百分点。文化繁荣发展呈现新气象：2016年，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为800元，比2013年增长38.7%，年均增长11.5%。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2012年4.24张增加到2016年5.37张；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由2010年的74.83岁提高到2015年的76.34岁。精准扶贫成效显著：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4335万人，比2012年减少5564万人，平均每年减贫近14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5%，比2012年下降5.7个百分点。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已成为全国的共识，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追求的目标。在新的建设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着眼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全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

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中央对香港、澳门全面管治权，深化内地和港澳地区交流合作，保持香港、



澳门繁荣稳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妥善应对台湾局势变化，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通过系列教育举措，使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至2017年6月底，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80多人、厅局级干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五年的时间虽短，但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变化却巨大。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①

2. 历史新方位的确定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新判断：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二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对中国历史新方位的定位。这个新时代具有五大特征：

其一，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第11页。

其二，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

其三，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其四，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其五，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三方面重大的意义：

其一，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其二，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其三，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从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到邓小平提出让中国人民富起来，到今天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强起来，能实现这一历史性飞跃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的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确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充分证明和肯定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坚持“四个自信”的正确性。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而发生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新方位判断而作出的又一正确判定。

正确认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把握两点：

其一，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其二，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中共十九大对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是对中共十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正确判断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情的准确认识。

中共十九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科学认识和判断，奠定了回答“怎样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时代问题的理论基础。

新时代、新变化带来新使命，中共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数能人志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但最终还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从建立那天起，就以此为已任，为此而奋斗，“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①都从未放弃。今天再次将此作为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体现了一个执政党应有的历史担当和责任。

3.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小康社会的五大目标要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共十九大根据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的现实情况，依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建党100周年时要达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了修正，提出了更高的六大目标要求：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一更高目标要求的提出，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乐观和自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第二个百年目标。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共十九大细化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进程：

其一，未来五年的两个历史作用时期。

从2017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从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其二，从2020年到2050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050年，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是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历史进程的规划，也是对未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安排。对于实施“两个一百年”目标进程中明确各阶段的目标、责任和战略重点，进而最终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当前中国人民的一项伟大事业，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在于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于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对此，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①《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时代问题。

十九大报告同时也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方略。其中特别强调要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四个方面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要提拔重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要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中共十九大是一段历史阶段的终点，也是新的历史阶段的起点，吹响了中国人民迈向新征程、夺取新胜利的号角。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因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②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 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0 页。